

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

斯文有传

学者有师

——欧阳修的文学与学术成就

顾永新 著
程郁缀 审定



大象出版社

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

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

斯文有传 学者有师

—— 欧阳修的文学与学术成就

顾永新 著
程郁缀 审定

大象出版社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斯文有传,学者有师:欧阳修的文学与学术成就/顾
永新著. — 郑州:大象出版社,2000.9

(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)

ISBN 7-5347-2450-3

I.斯… II.顾… III.欧阳修(1007~1072)-文学评论 IV.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13043 号

责任编辑 刘慧静

责任校对 霍红琴

出 版 大象出版社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政编码 450002)

发 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 (电话:0371—5726194)

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 5.375

字 数 104 千字

印 数 1—1 175 册

定 价 6.90 元

总 序

袁行霈 吴同瑞

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,光辉灿烂,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。今天,当历史车轮进到 20 世纪和 21 世纪交替的年代,中国人民又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历史使命。实现这一宏伟目标,既有重重困难,也有种种有利条件。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宝藏,对广大人民、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美德教育,就是我们的一大优势。毫无疑问,普及祖国的历史知识,弘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,向社会提供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,将对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,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,具有积极意义。有鉴于此,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大象出版社携手合作,共同推出“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”。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

北京大学具有研究和宏扬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和优势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,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一优势,学校领导于 1992 年初决定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。中心成立后,依托中文、历史、哲学、考古等系,组织各方面的教师和专家开展工作。一方面,致力于专深的学术研究,编辑出版《国学研究》年刊和《国学研究丛刊》;另一方面,注重于文化

普及工作，“将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”。与有关单位合作制作的电视系列片《中华文化讲座》和《中华文明之光》，已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。编写这套丛书是中心普及工作的又一尝试。中心希望丛书的作者们“眼界向上，眼光向下”，用大手笔写通俗性著作，学术性、知识性、可读性并重，力求深入浅出，使广大读者增长知识，陶冶情操。

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的产物，有精华也有糟粕，不加以区分不行；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，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曾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交流、碰撞与融合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，没有纵览古今、通观世界的眼光不行。我们抱着历史的态度、分析的态度、前瞻的态度、开放的态度，从事发掘与研究工作。这种态度也力求贯彻到本丛书中。然而，深入浅出地介绍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也不可能面面俱到，我们的选题只能侧重于重大的历史事件、重要的历史人物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；对那些目前尚未充分注意的学科如法律思想史等，也适当予以注意。

从选题和内容来看，这套丛书可分为文学、语言、历史、哲学、考古、法律、科技、中外文化交流等若干系列，每个系列都由研究中心聘请学术造诣较深的专家担任主编，每部书稿都经同行专家审阅。因此，中心不再对丛书作统一的审定工作。

大象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们非常重视这套丛书，把它列为重点出版书目，并为丛书的及时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辛勤的劳动，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本丛书的策划、编写工作一定还有许多不足之处，敬希读者批评指正。

目 录

一	欧阳修的生平经历	1
	(一)困学苦读 初仕西京	1
	(二)仗义执言 初贬夷陵	4
	(三)投身新政 再贬滁州	7
	(四)召为翰林 入主二府	11
	(五)外放亳州 致仕归颍	15
二	欧阳修的交游	20
	(一)范公知奖最深	20
	(二)三先生的感召	22
	(三)欧、尹兄弟交	27
	(四)良师益友刘原甫	29
	(五)发现人才 奖掖后进	32
三	欧阳修的文学成就	40
	(一)欧阳修的散文	40
	(二)欧阳修的诗歌	52
	(三)欧阳修的词	62

四	欧阳修的学术思想	73
	(一)砥砺名节 矫厉士风	73
	(二)尊韩复古 力肩斯道	80
	(三)宗经明道 经世致用	89
	(四)鄙薄传注 疑古惑经	103
	(五)曲尽人情 切于人事	114
五	欧阳修的学术成就	122
	(一)欧阳修经学概述	122
	(二)欧撰史书之体例	139
	(三)《集古录》的纂集	145
	(四)欧阳修的古文献学	150

一 欧阳修的生平经历

欧阳修(1007—1072),字永叔,四十岁自号醉翁,晚年又号六一居士,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、文学家、诗人和学者,在中国文学史和学术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(一) 困学苦读 初仕西京

宋真宗景德四年(1007)六月二十一日,欧阳修出生在绵州(今四川绵阳),其籍贯是江西庐陵(今江西永丰),因父亲欧阳观时任绵州军事推官,所以生在那里。欧阳观,字仲宾,为人仁厚,为官清廉,做过几任小官,两袖清风,一身正气。到大中祥符三年(1010)病逝时,全家竟致“无一瓦之覆、一垅之植”(《欧阳文忠

公集·居士集》卷二五《泂冈阡表》，《欧阳文忠公集》以下简称《欧集》）。衣食无着，母亲郑氏不得不带着年幼的欧阳修，远道投奔随州（今湖北随县）的欧阳晔。面对困境中的寡嫂孤侄，欧阳晔极尽叔父的责任，热情帮助，悉心照顾，其“严明方质”、“洁廉自持”的风范，也在欧阳修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三十多年后，欧阳修在《尚书都官员外郎欧阳公墓志铭》中对其“长养教育之恩”仍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情（同上卷二七）。正如宋人王楙《燕翼诒谋录》所说：“欧阳修少孤，其叔父教之学。”当然，最直接给予欧阳修启蒙教育的，还是他的母亲。郑氏夫人出身名门，“恭俭仁爱而有礼”（同上卷二五《泂冈阡表》）。丈夫死后，她承担起全部的生活重担，并把全部的爱心倾注到欧阳修身上，用丈夫的品行、风范来教导欧阳修读书识字、习文作诗、立身做人。家用不足，“贫无资，太夫人以荻画地，教以书字”，含辛茹苦，费尽心血。艰苦环境的磨炼，母亲、叔父的楷模，使欧阳修养成了刚直不阿、乐善好施、公正廉洁的优秀品质。其“天资刚劲，见义勇为”^①；“天性仁恕，断狱常务从宽”（《欧集》附录卷五欧阳发等撰《事迹》）；“果敢之气，刚正之节，至晚而不衰”（同上卷一王安石撰《祭文》）。

欧阳修少年时代困学苦读，夜以继日。家中无书可读，“就闾里士人家借而读之，或因而抄录，抄录未毕而已能诵其书，以至昼夜忘寝食，惟读书是务”（同上卷五《事迹》）。随州城南有大姓李氏，其子好学，家中藏书甚富，年方十岁的欧阳修多游其家。一次，“见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，发而视之，得唐《昌黎先生文集》六卷，脱落颠倒无次序，因乞李

氏以归”(《欧集·居士外集》卷二三《记旧本韩文后》)。从此,欧阳修开始致力于斯,三十年如一日校勘《韩集》,孜孜不倦地钻研其文、其道,并以韩愈之后力肩斯道者自命,终于把韩愈等开创的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进一步推向前进。

宋仁宗天圣元年(1023),欧阳修参加了随州的科举考试,试题是《左氏失之诬论》,尽管文章写得不错,却因出了官韵而名落孙山。四年(1026),欧阳修通过了州试,荐名礼部。第二年春天,试于礼部,但没有成功。又过了一年,欧阳修带着自己的文章,去汉阳(今属湖北)拜谒知汉阳军胥偃学士,备受他的赏识、器重,后来还成为胥偃的乘龙快婿。这一年冬天,在胥偃的带领下,欧阳修买舟北上,到都城汴京准备来年的考试。这一次果然一帆风顺,第二年春试国子监,欧阳修以《玉不琢不成器赋》荣获第一;秋试又以《人主之尊如堂赋》再居魁元。天圣八年正月,北宋文学名臣晏殊知贡举,所出的题目是《司空掌輿地之图赋》,欧阳修独以卓识俊才荣登省元。三月,欧阳修又通过仁宗御试,列甲科第十四名。五月,授将仕郎,试秘书省校书郎,充西京(今河南洛阳)留守推官。

天圣九年三月,欧阳修来到西京,在留守钱惟演的幕府中任推官。这里有自由宽松的环境,有志同道合的朋友,有稽古右文的上司,所以欧阳修生活优游,精神振奋,在文学创作上有了长足的进步,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。居官洛阳的三年里,欧阳修结识了一批文学或学术上的同志,有的后来成为一生的莫逆之交,如尹洙(师鲁)、梅尧臣(圣俞)、

谢绛(希深)、苏舜钦(子美)等,他们对于欧阳修走上古文创作的道路,倡导诗文革新运动,及其学术著作如《五代史记》的完成,都有直接的帮助或影响。欧阳修在他的很多诗文中也倾吐了这种深厚友谊和深挚感情,著名的《七交》诗即对尹洙、梅尧臣等做了生动的描述,其《自叙》云:

赖有洛中俊,日许相跻攀。饮德醉醇酎,袭馨佩春兰。平时罢军檄,文酒聊相欢。(《居士外集》卷一)

在洛阳期间,友人们相约游历了中州一带的很多名胜古迹,留连风景,歌唱友情,欧阳修有《游龙门分题十五首》、《嵩山》组诗十二首等诗作。这一时期,是欧阳修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高峰期。

(二) 仗义执言 初贬夷陵

景祐元年(1034)三月西京秩满,欧阳修归襄城(今属河南)看望妹妹和妹丈。五月,来到京师。闰六月,授宣德郎、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、充镇西军节度掌书记、馆阁校勘,参与编撰《崇文总目》。《崇文总目》是北宋的国家藏书目录,其书不传,但欧阳修所作的《崇文总目叙释》保存在《欧集》中,在中国目录学史上仍有一定的影响。尽管欧阳修在事业上一路顺利,但家庭生活却连遭不幸。景祐二年七月,其妹丈张龟正死;九月,新婚仅十个月的妻子杨氏也不幸病故。连续的打击,使欧阳修的精神受到重创,心力交瘁,他病倒了。但他仍牵挂国事,上书御史中丞杜衍,仗义执言,

强烈要求任用石介(详见《上杜中丞论举官书》,《居士集》卷四七。石介,字守道,时为御史台主簿,以言事见罢)。

景祐三年(1036),范仲淹与宰相吕夷简的矛盾激化。范上“百官图”,指出吕用人不当,“进用者多出其门”,并上《帝王好尚》等四论,力陈时弊。吕反过来攻击范“越职言事,离间君臣,引用朋党”。结果,范贬知饶州。此事引起正义人士的极大愤慨,余靖“请追改前命”;尹洙则“愿从降黜”。两人也相继遭贬^②。可是,左司谏高若讷趋炎附势,非但不主持正义,反而诋毁范仲淹。欧阳修激于义愤,奋笔写下了著名的《与高司谏书》,痛斥身为谏官的高若讷尸位素餐、颠倒是非,“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”(《居士外集》卷一七)。高恼羞成怒,将信上交,并诬蔑欧扰乱视听,结果欧也被加上朋党的罪名,贬知夷陵(今湖北宜昌)^③。

欧阳修匆匆南行,长途跋涉,“溯汴绝淮,泛大江,凡五千里,一百一十程,才至荆南”(《欧集·书简》卷九《与薛少卿》)。虽然一路上见到不少朋友,但也无法抹去他心头的失意和不遇之感。旅途上的诗作大多有淡淡的忧伤,如《琵琶亭》云:

乐天曾谪此江边,已叹天涯涕泫然。今日始知予

罪大,夷陵此去更三千。(《居士外集》卷六)

抑郁之外,更有几分不平之气。不过,他并没有消沉下去。十月到达夷陵后,欧阳修于政事之余暇,又与尹洙相约合作《五代史》,并写下了很多赞美大自然的诗作。同时,他也没有因为遭贬而作“戚戚之文”,而是放眼国家大事,感叹并贬斥“在位者”不以家国为念,目光短浅,局限于个人“光荣而

饱”的物质满足(《居士外集》卷二三《读李翱文》)。景祐四年(1037)三月,欧阳修又赶到许昌(今属河南),娶已故参知政事薛奎第四女,这就是陪伴欧阳修度过一生大半时间的薛氏夫人。是年十二月,欧阳修移乾德(今湖北光化)县令,翌年三月赴任。其时乾德正逢旱灾,欧阳修照例写了两篇求雨的祭文,但他把天早的原因不仅归于山川之神,而且归咎于“吏之贪戾,不能平民,而使怨吁之气,干于阴阳之和而然也”(《居士集》卷四九《求雨祭文》)。这种重人事、讲吏治的思想确实是难能可贵的。

宝元二年(1039),梅尧臣调知襄城(今属河南),谢绛出知邓州(今河南邓县)。欧阳修喜出望外,五月间来到邓州和乾德之间的清风镇,跟梅、谢二人会面。久别重逢,更何况“为别五六岁,贬徙三年,水陆走一万二千里,乃于此处得见故人”(《欧集·书简》卷六《与梅圣俞》),其惊喜、复杂的心情可想而知。短暂的欢聚,未能尽区区之怀,欧阳修返回乾德后写下了《答梅圣俞寺丞见寄》一诗,追忆五六年来的人事变迁,颇多感慨。虽然“王事多倥偬,学业差遗忘”,“举足畏逢仇,低头惟避谤”,但故人重逢,“交情宛如旧,欢意独能强”(《居士外集》卷三)。

为了对付日益吃紧的西线形势,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等革新派人物。康定元年(1040),范仲淹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,肩负着边防重任,“于翰墨无暇可为”^④,推荐欧阳修为经略掌书记。欧虽然十分敬重范,但认为知之不尽,用之不当,所以没有应召前往。是年六月,欧阳修被召还京师,官复馆阁校勘,仍修《崇文总目》。十月,转太子中

允，同修《礼书》。庆历元年(1041)，《崇文总目》修成，欧阳修改集贤校理。此时，朝廷内忧外患，“夷狄叛”、“盗贼起”、“水旱作”、“民力困”、“财用乏”，欧阳修急切地向宋仁宗进言，力陈时弊，提出致治之术，有长达五千言的《准诏言事上书》(《居士集》卷四六)。但赤诚、恳切的话语并没有感动圣听，加之此前宰相吕夷简力荐富弼出使契丹，欧阳修“上书引颜真卿使李希烈事，乞留弼，不报”(《欧集》卷首《年谱》)，欧阳修不免大失所望，自请外放。九月，通判滑州(今河南滑县)，十月到任。

(三) 投身新政 再贬滁州

庆历三年(1043)，宋仁宗“广言路，修政事，人多荐公宜为台谏”(《欧集》卷首《年谱》)。于是，是年三月，欧阳修被召回，转太常丞，知谏院；十月，擢同修起居注；十二月，又以右正言知制诰，仍供谏职。欧阳修忠言谏论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充分发挥了谏官的职能，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，先后上呈的奏议就有近七十篇，热情地支持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等革新人物及其举措，同时也极力贬斥吕夷简、夏竦等保守派分子，为“庆历新政”摇旗呐喊、推波助澜。随着形势的发展，仁宗加快了改革步伐。八月，以范仲淹为参知政事，富弼为枢密副使，韩琦为陕西宣抚使；九月，开天章阁，召对重臣。范仲淹奉诏条上“明黜陟”、“抑侥幸”等十事，仁宗降诏颁布天下，是为“庆历新政”。随着新法的推行，保守

派的反对和破坏也愈演愈烈，而朋党之说最为其利器，诬称范、韩等人“朋党”专权，这使本来就心存疑虑的仁宗顾虑更大了。欧阳修及时地上呈《朋党论》，指出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，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，所以君子有朋，小人无朋。作为君主，应当“退小人之伪朋，用君子之真朋”（《居士集》卷一七）。然而，形势急转直下，杜衍、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等相继被罢官外放，未满一年的“庆历新政”遂告夭折。

庆历四年（1044）三月，欧阳修奉命出使河东，“计度废麟州，及盗铸铁钱并矾课亏额利害”（《欧集》卷首《年谱》）。七月，还京师。八月，除龙图阁直学士、河北都转运按察使。在他的极力劝阻之下，河北宣抚使富弼打消了杀死二千降卒的念头，一场虐杀被制止了。第二年春天，真定帅田况移秦州，欧阳修权知真定府事三个月。其时杜、范、韩、富已罢去，欧阳修上书辩之，力陈四人恪尽职守，忠于国事，也表明了自己“不避群邪切齿之祸，敢干一人难犯之颜”的坚决态度（《欧集·奏议集》卷一一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》）。保守派本已忌恨他，这样一来他就更成为怨府了。权知开封府杨日严、右正言钱明逸等串通起来，指控欧阳修与甥女张氏有私，并涉及侵吞财产等事。欧阳修被执下开封府，数月之后，此事终因“券既弗明，辩无所验”（《欧集》卷首《年谱》引《谪滁州制词》）而不了了之，欧阳修则罢都转运按察使，降知制诰，知滁州（今安徽滁县）。

庆历五年（1045）十月，欧阳修到达滁州。滁州景色秀丽，民风淳朴，欧阳修徜徉山水，施政宽简，寄情诗酒，不求赫赫之誉。这种闲适的生活对于遭受政治斗争打击的欧阳

修来说,确实是一种慰藉;但他也不免表现出失意、怅惘的心情,甚至有放浪形骸、遁世归隐的消沉情绪。这一时期,欧阳修留下了大量流连山水、诗酒游乐的文学作品,往往以轻松、闲适的笔调,摹写朴质、优美的景物,表达洒脱、恬静的心情。著名的有《丰乐亭记》、《醉翁亭记》等散文和《丰乐亭游春》、《题滁州醉翁亭》、《游琅琊山》等诗作。这是欧阳修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。

虽然从诗文中反映出来的基调是明朗的,多的是怡然之情,少的是沉沦之气;但是,曾经锐意进取、忧国忧民的欧阳修心里怎么能真的平静下来呢?他自号“醉翁”,然而“四十未为老,醉翁偶题篇。醉中遗万物,岂复记吾年”(《居士外集》卷三《题滁州醉翁亭》)?历历往事和纷繁现实又怎能因为一醉而忘却呢?就在欧阳修下开封府的时候,他的好友石介受“大奸”夏竦等迫害,饮恨而死。夏竦却连死人也放过,借口从徐州谋反的孔直温家中搜得石介的书信,诬蔑石介诈死,已在富弼指使下北逃契丹,要求斫棺验尸,以图把革新派一网打尽。后因杜衍等据理力争,石介幸免于斫棺之辱,但妻儿都被羁管他州。欧阳修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懑,写下了著名的《读徂徕集》一诗,高度评价了石介卫道宗儒、刚直不阿而又屡遭磨难的一生,坚信历史自有公论,“圣贤要久远,毁誉暂喧哗”(《居士集》卷三)。后来又有《重读徂徕集》一首,无限感慨石介蒙受的不白之冤,表明自己毅然决然的态度:“我欲犯众怒,为子记此冤。下紆冥冥忿,仰叫昭昭天。书于苍翠石,立彼崔嵬巅”(同上)。表现出对朋友遭遇的义愤填膺,同时也是同病相怜,感叹自己的身世

和境遇。

庆历八年(1048)闰正月,欧阳修转起居舍人,依旧知制诰,徙知扬州,二月到任。扬州在当时已是东南重镇、通都大邑,政务繁重,欧阳修又患眼疾,觉得力不从心;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忧馋畏讥、倦于政治斗争的风波。所以,欧阳修自请改知他郡。皇祐元年(1049)正月,他获准移知颍州(今安徽阜阳),二月到任,从此和这个美丽的地方结下了不解之缘。颍州有西湖之胜,可与杭州西湖相媲美。欧阳修流连于如此秀美的自然风景之中,心旷神怡,遂有卜居之想。更何况这里时常有朋友往来,如宋敏求、吕公著、刘敞、王回、焦千之等,更增添了他的兴致,留下了不少写景、记游的动人诗篇。不过,作为一个正直的政治家,欧阳修并不完全是游山玩水、赏心取乐,他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也很关心,著名的《食糟民》一诗,相当尖锐地揭露了人民生活的苦难和悲惨境遇,对官吏进行了讽刺和抨击。

皇祐二年(1050)七月,欧阳修改知应天府(今河南商丘),兼南京留守司事。十月,又转吏部郎中,加轻车都尉。虽然加官进爵,但欧阳修仍然深深地眷恋着颍州,念念不忘那里优游的生活。这一年,他约好友梅尧臣买田于颍,共度晚年。皇祐四年三月,母亲郑氏夫人病逝,这使欧阳修陷于深深的痛苦之中,回到颍州,他“攀号冤叫,五内分崩”(《欧集·书简》卷一〇《与十四弟焕》)。两月之后,范仲淹的逝世无疑是雪上加霜,更加重了欧阳修孤寂、凄苦的心境,隐退的念头更加强烈了。第二年八月,欧阳修自颍州护母丧归,葬于吉州之泂冈,胥、杨二夫人祔之。冬天,欧阳修又回到